

“寒门贵子”现象的逻辑向度、问题审视与理性回归

黄 玲¹ 郝 明 君²

(1. 重庆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 2. 重庆师范大学 职教师资学院; 重庆 401331)

摘 要:在教育研究与实践领域,“寒门贵子”议题备受关注并引发热议。立足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三重概念框架,“寒门贵子”现象透露了社会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印刻了文化资本逻辑的历史映像、折射了经济资本逻辑的绩效主义。但是,随之衍生出的问题表征为:对寒门学子神化或矮化、对家庭教育方式肯定或诘问、对人才培养选拔制度认同或质疑。因此,需从多元路径引导“寒门贵子”现象的理性回归,一是深化理论研究,挖掘“寒门贵子”现象的多重价值;二是树立全过程育人理念,推动“寒门贵子”现象成为常态;三是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丰富“寒门学子”的文化资本资源;四是多元看待“寒门学子”的立体化处境,进一步畅通成才路径。

关键词:寒门贵子;教育公平;逻辑向度;理性回归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4)06-0032-09

DOI:10.19742/j.cnki.50-1164/C.240604

“寒门贵子”从广义观之,主要“指经济资本匮乏、文化资本欠缺,但却取得了优异学业成绩的弱势群体学生或低阶层学生”^{[1]114}。狭义来看,无论学术讨论还是公众感知皆普遍认为,“寒门贵子”是指农村户籍生源考上重点高校(主要指以前的“985”“211”以及当下的“双一流”高校)的社会现象。21世纪伊始,在国内高校扩招和城市化速度快速提升的双重交错背景之下,“寒门贵子”概率逐渐降低以至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如“清华大学新生农村户籍1990年比例是21.7%,2000年跌至17.6%,2016年仅为10.2%,北京大学新生农村户籍1985年比例高达38.9%,2005年跌至17.7%,2013降至14.2%,复旦大学2009年至2015年的新生农村户籍占比从未超过20%”^[2]。即使在2021年,仅以北京大学为例,录取农村户籍生源“只有442人,占内地学生人数的15.1%,还为近年最高”^[3]。进入21世纪以后,对“寒门贵子”现象的研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风格差异。21世纪头十年,主要从“寒门学子”读大学后的资助政策入手进行研究;随着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出台,学界关注“寒门贵子”现象多与高考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相互关联起来,不仅在数量上呈现出快速增长之势,且从历史社会学^[4]、媒介话语权^[5]等多层视角辩证看待其背后的复杂关系,具而言之:一方面基于文化资本^[6]、学校的教学手段^[7]、家庭教养方式^[8]等维度分析了“寒门学子”的发展差距;另一方面也有学者秉

收稿日期:2024-10-26

作者简介:黄 玲,女,教育学硕士,重庆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教师教育。

郝明君,男,教育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职教师资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基本理论、课程论、教师教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程的一体化设计研究”(22VSZ092)。

持“底层文化资本”^[9]观点,致力于剖析“寒门何以能出贵子”的内部逻辑与育人价值。为更加深入理解“寒门贵子”现象的多重交互关系,文章立足“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时代诉求,从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三重概念框架出发,阐释“寒门贵子”现象的逻辑向度,进而分析问题根源,尝试抛出理性回归思路。

一、“寒门贵子”现象的逻辑向度

“寒门贵子”现象虽然不是中国社会特有物,然其根植于漫长历史文化土壤,又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教育制度环境影响,是多重社会场域交互产生的复杂型社会现象。本文基于布尔迪厄提出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三位一体”资本概念框架,尝试揭示出“寒门贵子”现象的内部机理。

(一)“寒门贵子”现象透露了社会资本逻辑的“二律背反”

“‘寒门’与‘贵子’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和身份,这一内在矛盾使这一话题具有强大的舆论和学术吸引力。”^{[10]36}这种“二律背反”的矛盾体,反映出布尔迪厄社会资本思想的二重性。社会资本“是个体或群体处于相对稳定和制度化的人际网络中所积累的资源”^{[11]46},本质实为社会团体中群体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以促使社会网络有效联结在一起。“寒门贵子”现象既是社会资源固化的现实映照,亦是民众对于社会阶层跃迁的期待。一方面,缘起对“寒门难出贵子”^[12]的阶层固化隐喻。随着社会阶层固化的程度愈发加深,相较于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末高校尚未大规模扩招的这段人才断层期,在高等教育已然进入普及化阶段的当下社会,通过学历改变命运的概率似乎越来越低。故而,所谓“物以稀为贵”“寒门贵子”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实质上透露出当下社会阶层越来越固化的“隐疾”,表明因阶层固化加剧带来的社会流动速度降低。另一方面,“寒门贵子”现象更能彰显社会阶层跃迁的公平正义价值。“寒门贵子”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多半是因其自身的勤奋、努力、坚韧、踏实等品质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使其能够实现横向跨区域的空间流动和纵向跨阶层的区位流动,从而体现出社会流动的正向价值功能。在此意义上,“寒门贵子”现象既能为普通民众提供“人定胜天”的情绪价值,也成为打破阶层固化“怪圈”的榜样示范。

(二)“寒门贵子”现象印刻了文化资本逻辑的历史映像

文化资本是“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13]118},可以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具备浓厚崇尚知识和践行伦理的文化资本累积惯性。在从“学而优则仕”到“唯有读书高”的中国古代漫长社会中,无论朝代更迭抑或时代变局造成的社会变迁,社会群体在长时间儒家文化浸润后,始终信奉“读书改变命运”的信条。由此,文凭作为“提高能力和提高社会地位”^{[14]15}的关键凭证,已然是政策制定者、理论研究者以及教育实践者等利益相关群体的共识性“信条”。仅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等历史文化警句中就可见一斑。这种民族文化资本累积所建构的社会心理场域,对于“寒门贵子”现象具有本能的推崇心态。一方面,“知识改变命运”成为无数寒门学子孜孜奋求的指路明灯,为其不断自我超越供给源源不断的文化内驱力。另一方面,“寒门贵子”现象又能为“教育创造未来”的社会信条注入“强心剂”,促使社会文化生态的“向教(育)性”,期待并呼吁着教育公平理应成为践行社会正义的重要基石,继而推动教育公平从低水平的机会公平迈向高质量的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最终实现教育公平发展范式的整体变革。

(三)“寒门贵子”现象折射了经济资本逻辑的绩效主义

首先,“寒门贵子”现象之所以被热捧在于对“经济基础决定学生发展”观念的反叛。受到“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认识钳制以及教育市场化侵蚀等多重因素交互影响,课外培训之风在“双减”政策执行以

前呈现出野蛮生长之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3年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821元、同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1691元”^[15]。城乡居民经济收入“鸿沟”导致农村户籍学生获得的校外培训资源相对较少,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显示,“家住在农村地区的农村户籍学生课外补习平均支出为1849元,城镇户籍学生为3258元”^{[16]78}。“寒门贵子”现象受到追捧亦与底层家庭对这种经济资本导向的教育功利主义作斗争相关联,反映出社会民众对于教育本真要义的朴素追寻。

其次,“寒门贵子”现象之所以热度不减是因为“升学率”指标的教育绩效主义作祟。尽管有“清北率”“985和211上线率”“重本率”“‘双一流’上线率”以及“特殊资格达线率”等称谓变化,但实质上仍旧表露出教育行政部门、家长以及社会舆论对“好高中”的核心评价权重,即“升学率”。简言之,较之于学生综合素质、校园文化建设、家校合作等,“升学率”更易被评价和权衡,贡献者(如班主任、任课教师、竞赛教练乃至学校等)更易于被识别,能显著提升地方政府、学校以及教师的“办学政绩”,由此便能有力地激发“晋升锦标赛”^[17]效应,其根源是挥之不去的教育绩效主义在作怪。

二、“寒门贵子”现象的问题审视

作为一种时常被炒作的社会现象,“寒门贵子”有其理论映射、文化熏陶、乡村实际等方面缘由,是事物发展的应然性与实然性的对立与统一,也是当下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布局等衍生的产物。具而言之,“寒门贵子”现象透露出以下几方面问题表征。

(一)对寒门学子神化或矮化

1.“寒门贵子”被神化,其现实困境被无视

在社会公众或媒体视域中,“寒门贵子”“总是被认同、简化、夸大和刻意拔高”“成为现在的能量源泉”^{[18]323}。这是社会公众或媒体对“寒门贵子”的一种高度“神化与认同”^{[19]175},是对他们考取名校的认可、赞赏乃至感慨。社会公众或媒体在神化“寒门贵子”同时,总是淡化他们身上的一些“暗面”,也就是他们所背负的客观存在的矛盾心理、生活适应、认知取向等实然困惑。

其一,“寒门贵子”喜忧参半的矛盾心理被忽视。“寒门贵子”之所以能够考取名校,与其所秉持的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志向不无关联。他们坚守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通过自身努力谋划人生未来;他们考取名校,喜悦之余也心怀忐忑,因为暂时声名鹊起的他们可能会与自己的父辈渐行渐远,他们会产生“一种撕裂的感受,它出于一种成功即失败的体验”。总之,由于各种原因,“寒门贵子”的心情是矛盾、复杂的,成功的喜悦始终与内心的失落相生相伴,无论是高校还是社会应该予以关注和引导。其二,“寒门贵子”名校生活的不适之况被漠视。由于家庭背景、生活经历乃至社会认知的差异,“寒门贵子”在人生起跑线上相对落伍,入学后可能面临在校生活的诸多不适。研究表明,“贫困大学生参与学术科研活动、文体活动以及各类学生社团活动的积极性显著低于非贫困大学生,贫困大学生在活动参与方面相对来说更为自卑和被动”^[20]。这些寒门学子进入大学前,往往没有条件和精力去拓展个人视域、去提升自身综合素养;恰恰相反,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父母教育方式科学、课外各类活动丰富的学子进入大学后,便如鱼得水,他们自信地参加学校乃至社会上的各种学术活动、文体活动、社团活动,成效明显,这种落差让“寒门贵子”心生失落、不甘,自卑情结黯然生成。其三,“寒门贵子”某些优良品质“异化现象”被轻视。“寒门贵子”一般拥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品质、坚定持久的学习目标、自我驱动的学习能力、勤奋用功的学习习惯、吃苦耐劳的生活态度等优良品质,这是他们考取名校,成为“贵子”的助推剂。在文化资本、社会资源相对匮乏的部分“寒门贵子”看来,输在起跑线不丢人,不能埋怨家庭,而是要依靠自身奋斗与坚守,去弥补缺憾并提升自己,通过自身文化资本累积,在社会阶层流动中实现“我奋斗了十八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梦想。就“寒门贵子”而言,他们的勤奋、坚毅本无可非议,但带有固执意蕴

的坚毅乃至倔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锲而不舍精神品质,而是一定程度上的偏执,容易使其在情绪、性格、行为等方面带有一定的负向性。也就是说,受家庭背景、社会经历、自我认知等因素影响,部分“寒门贵子”身上某些优良品质开始异化,但是由于社会公众过于夸大、神化“寒门贵子”,这种异化现象并没有引起公众或媒体过多关注。

2. 非“寒门贵子”被矮化,其辛勤付出被遮蔽

社会公众和媒体关注的考取名校且来自寒门的大学生常被称为“寒门贵子”,与此相对应的则被视为非“寒门贵子”,主要有三类:因高考折戟没有考取大学的寒门学子、考取专科院校的寒门学子、考取二本及以下本科院校的寒门学子。第一类寒门学子径直步入社会,从事外卖、快递、建筑等职业,其间的辛酸往往超出常人的想象。第二类寒门学子“从‘独木桥’上被挤下”“只是作为同龄人……的反面教材而存在着”^[21]。因为高考失利,这两类学子中不少人“被一种无能感、失败感、卑微感所压制,个人自尊降到了最低限度,并对自我的价值持一种否定态度,而对家庭和家族充满了负罪感”^{[22]282}。为此,有的不甘心但又很无奈,有的甚至一蹶不振。之所以无奈,是缘于自身能力欠缺,因为“当前大部分人未能实现上升流动的重要原因,在于自身未能很好地创造或坚持有助于学业成功的文化品质”^{[10]40}。第三类寒门学子也被遮蔽或质疑,他们更显无奈。毕竟“在大众化教育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只有少数人能进入光彩夺目的重点大学,更多的则走进数量极为庞大的普通二本院校”^{[23]序言2}。其实我国不少二本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上乘、办学实力不俗,不逊色一些“名校”。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学子应有的“璀璨”往往被“寒门贵子”的光环所掩盖,而他们学习生活的“艰辛”又映衬出“寒门贵子”学习能力的“异彩”,“寒门贵子”被过度“神化”。总之,公众或媒体对“寒门贵子”的过度关注乃至神化,导致公众或媒体对高考折戟者的质疑。

(二)对家庭教育方式肯定或诘问

1. 育子有道:“寒门贵子”的家庭教育方式被肯定

“家庭教养方式的不同,造就了不同阶层子女的生活机会。”^{[24]85} 公众或媒体关注“寒门贵子”时,习惯从他们家庭教育方面探寻成功之道,对他们静态的家庭习惯、教养方式、家风家训等影响因素予以挖掘并肯定。延安某农民家庭五个孩子中四个已分别进入清华或北大读书,还剩一个在备战。研究者分析该事例得出,“良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根基”,在父母看来,“再苦再累也要把孩子们供上大学”,因为“父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孩子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正是基于良好家庭教育氛围,寒门子弟逆袭成功^[25]。

在公众看来,“寒门”之所以能出“贵子”,与父母家庭教育息息相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家长的教育信念执着坚定。“家庭对教育改变命运的坚定信念构成农家子弟突破阶层壁垒的文化资本。”^{[26]123} 尽管寒门父母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相对匮乏,但是他们对知识改变命运的坚定信念潜移默化影响到子女对待教育的态度,子女的学习内驱力增强,成功概率增加。其二,家长的教育方式张弛有度。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教育期望致使子女形成学习压力,父母理解宽容、引导支持的亲情熏染易使子女获得精神支持,子女在严、慈结合的家庭教育氛围中,更容易获得心理平衡、学习斗志。其三,家长的家庭支持刚毅有力。寒门家庭受制于资源和条件,培养子女实现阶层向上流动需冲破家庭资源匮乏的限制,为此“寒门贵子”的家庭教育参与度更强。父母愿意砸锅卖铁、举全家之力培养子女成才成为一种事实。寒门家庭参与教育一般有底层资源限制论和底层文化资本论两种认识。底层资源限制论认为,农村家庭受限于其社会经济地位,很难通过教育改变阶层地位;底层文化资本论则认为,农村家庭虽然身处弱势,但可以通过动员内在的文化资本来实现教育目标。有的家庭为实现子女的阶层流动,积极搭建适应子女学业的学习环境——“寒门温室”^[27];有的家庭积极为子女寻求重要他人的支持或重要的人生机遇,从而实现人生的逆袭,获得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显著提升^[28]。底层资源限制论认为,

尽管少数人能通过教育完成阶层流动,大多数家庭参与者都只能以失败告终,但是为实现阶层向上流动,寒门家庭父母竭尽所能提供家庭支持。

2. 教子无方:非“寒门贵子”的家庭教育方式被诘责

多数寒门学子没有成为“贵子”,纵然有经济条件欠佳、教育资源不均、师资力量匮乏、社交圈层狭窄、心理压力困扰等因素,但父母作为子女的第一任老师,家庭作为子女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的方式和质量直接影响子女的成长和发展。然而现实中,有的贫困家庭不能为子女提供良好家庭教育环境,有的甚至无法保障基本的教育。有的家长虽然重视教育,但是由于条件限制,只能让子女随波逐流、自然成长。“底层家庭的孩子‘自然成长’的教养方式背后是父母受资本劣势与阶层意识的局限,他们能够为孩子提供的教育投资或支持行为表现出诸多的疲态与无力感,孩子更少参与结构化的社会活动。”^{[8]1}

不少寒门学子之所以没有成为“贵子”,良好家庭教育氛围缺失或家庭教育出现问题为主要缘由,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家长教育观念偏颇。有“寒门”家长不重视子女教育,面对大学生就业难暂时性困境,尤其是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匮乏的农村家长顽固秉持“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和态度,不鼓励、不支持子女读书。其二,家长教育目的不明。有“寒门”家长认为孩子到了上学年龄就该去学校上学,至于子女上学到什么程度、将来能干什么,是子女自己的事情,与父母无关。“学校的常规像一本无法参透的书本一样,家庭只知道送孩子去学校,对于孩子的学习和适应却无法给予适度的支持和帮助。”^{[29]51-55}其三,家长参与学校程度不高。“寒门”家长普遍认为教育孩子是学校的事情,更谈不上“家校社合作”共同培养子女。家庭参与学校教育的积极性不高,这在社会底层家长中表现尤为明显。

(三)对人才培养选拔制度认同或质疑

1. 成效彰显:人才培养选拔制度的优势被认同

在现行学校教育制度下,不少学校培养出一些“寒门贵子”。公众或媒体在神化“寒门贵子”时,也会更加关注录取他们的高校。换言之,“寒门贵子”被“神化”的同时,录取“寒门贵子”的名牌大学进一步被神化,“通过神化与认同的辩证关联,名牌大学选择那些因为得到了它的选择而选择它的人”^{[19]175}。随着名牌高校被进一步神化,各级升学选拔制度的优点被夸大,所读重点学校被关注。就升学制度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不断进行“小升初”、中考、高考等升学制度改革。自1998年以来,仅高考招生制度就改革了4次。改革目的是优化招生,以促进教育资源合理分配、城乡教育机会均等,从而使现行招生工作更加科学、公正、透明。正因如此,社会公众站在利己视角对高考制度进行肯定性评价。基于升学制度带来的利己成效,公众对现行升学制度予以肯定、夸大乃至神化也就不足为怪。

2. 有失公允:人才培养选拔制度的缺憾被质疑

在部分社会公众或媒体看来,现行学校教育制度存在诸多不足,非“寒门贵子”的生成是一种现实应然。他们对那些没有走出寒门的学子表示遗憾和不平,表现为部分媒体矮化没有造就出“寒门贵子”的招生制度。这从诸多新闻报道中可窥见一斑,诸如《“寒门难出贵子”是全社会的悲哀》^[30]《不能坐视“寒门难出贵子”》^[31]《莫让“寒门难出贵子”》^[32]等。媒体探求寒门难出贵子的缘由,其主要聚焦两方面:其一,将矛头指向各级升学选拔制度。研究者发现,寒门之所以难出贵子与我国各级升学选拔制度有失公平不无关联,譬如,“从小学升入初中、初中进入高级中等教育、从高级中等教育升入大学等层层关口(加上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的辍学),有大批农民子弟被淘汰”^{[33]76}。其二,对重点学校褒贬不一。研究者认为,我国不少地方较为流行的建设重点学校的做法似乎难辞其咎。其后果是,相对于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民众而言,优势阶层的子女更容易就读重点中学的现象就被合理化遮蔽,某些重点中学存在的“对学生高压管理”“掐尖优秀生源”“破坏教育生态”^[34]等问题也往往被遮蔽。

三、“寒门贵子”现象的理性回归

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三重视域之下的“寒门贵子”现象具有复杂性。这种实然逻辑向度致使在学生发展、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方面衍生出系列问题。鉴于此,需理性审视“寒门贵子”现象,并从以下维度付诸行动。

(一)深化理论研究,挖掘“寒门贵子”现象的多重价值

由于人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高考成绩并不能用来论证一生无虞的幸福。有鉴于此,应以平常心看待“寒门贵子”“本来高考就只是起点,谁能拿它说一生?”^[35]“寒门贵子”现象涉及到文化理念、户籍制度、教育资源分配、高考改革、个体主观能动性等多重因素,其背后是一个复杂交错的社会网络,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型社会现象,需要通过理论研究辨识“寒门贵子”现象的多元交互归因机制。一方面,在理论研究基础上,用辩证思维挖掘“寒门贵子”现象的多维价值体系。不但要剖析其内部隐藏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负面因素,也要挖掘“寒门贵子”现象背后的奋发向上、激励人心以及贡献社会等积极功能,尤其是“寒门贵子”现象对于改进教育公平,实现机制的正向显性价值可以持续进行挖掘。另一方面,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强化对“寒门贵子”现象的正向舆论引导。对诸如“小镇做题家”“凤凰男”等“寒门贵子”现象负面价值的过度关注,极易桎梏社会公众的理性判断力,而忽视其内在的正向功能。因此,可以经过深入理论研究提炼出“寒门贵子”现象蕴含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自我教育等维度的鲜活案例,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主流媒体平台强化舆论宣传引导,增强社会大众对于“寒门贵子”现象的理性认识。

(二)树立全过程育人理念,推动“寒门贵子”现象成为常态

如何促进“寒门贵子”现象的进一步普遍化,使其从“稀缺”走向“大众”,这个过程就是社会公平理念与教育均衡发展政策的现实映照。通过树立全过程育人理念,不再拘泥于“事后补救”的“亡羊补牢”,而是指向于“事前准备”的系统规划,推动“寒门贵子”现象成为常态。

首先,建设一批高质量的县域普通高中。由于“越是不发达地区,重点中学越重要”^{[36]115},以及“县一级重点中学的设置与训练是农村学生与乡镇学生进入精英大学最重要的途径”^{[37]88},故而应在《“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基础之上,进一步强化县中建设。通过东西协同、城乡联动等机制,完善中西部地区县中发展的对口帮扶机制,依托转移支付制度,在经费预算、师资队伍、教研科研、硬件设施等方面强化对县中发展的全方位支持,为更多“寒门子弟”提供跨越龙门的平台和机遇。

其次,持续优化“高考定向招生”政策支持体系。2012年,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的通知》(简称“国家专项计划”),为“寒门学子”升入重点高校提供了降分录取优惠政策。“高校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与“国家专项计划”共同组成了面向农村地区的“高考定向招生”政策体系,有力保障了“寒门学子”的上升通道,“截至2022年,已有95万余名学生通过专项计划进入重点高校”^{[38]4}。然而,面对基数庞大的“寒门学子”群体,“高考定向招生”政策仍有改进优化的空间。一方面,扩大“高考定向招生”的院校规模。可以将“双一流”高校以及省属重点高校纳入到三大“专项计划”范畴,进一步降低政策准入门槛和扩大院校参与规模,并适当要求院校增加优势专业的招生比例。另一方面,提升“高考定向招生”的政策比例。目前,“国家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分别要求不低于学校专业招生的2%与3%，“高校专项计划”则没有统一的硬性要求。建议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以及办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定位,经过审慎的多方论证后适当增加面向农村的“高考定向招生”比例,为更多“寒门学子”发展提供优惠政策支持。

最后,为“寒门学子”可持续发展构建一体化成长支持体系。一方面,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做好职业

生涯规划教育。依托专题讲座、社团课程、研学活动、主题班会等多种方式,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以帮助寒门学子提前了解和掌握在大学里学习和生活需要必备的一些技能和素质,从而在源头上缓解甚而杜绝“寒门贵子”上大学后难以适应的困境。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阶段更加关注新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教育。“寒门贵子”在从高中迈向大学、农村迈向城市过程中,必然会遭遇一定程度的认知冲突和心理失调,需要高校在新生入学后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利用专业课程、结对帮扶、心理咨询等途径,为“寒门贵子”提供个性化指导,引导其尽快适应大学生活并积极做好学业规划。同时,还应加强高校的资助育人体系建设,使经济贫困大学生在勤工俭学过程中获致综合素养的整体提升。

(三)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丰富“寒门学子”的文化资本资源

“寒门贵子”现象之所以能够“打破了文化乃至阶层的再生产”^[39]桎梏,离不开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三者的协同支持。首先,完善农村地区的家校共育机制。针对农村地区家庭教育资源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的现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调动相关政府部门、社团组织、专业科研机构等多方力量,强化农村地区的家校共育机制建设;通过开发系列课程,打造一批家校共育能力出众的乡村教师队伍,实施数字化赋能家校共育资源平台建设等措施,推动农村地区家校协同育人质量的不断攀升,为“寒门学子”发展提供有益的家庭资本支持。

其次,加大农村地区优质社会教育资源的供给力度。由于农村地区优质社会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导致寒门学子可持续发展面临很多困境。一方面,借助精准扶贫模式畅通农村社会教育的运行机制。无数事实已经证实教育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积极功效,“寒门贵子”现象更能激发普通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无限希冀。充分借鉴精准扶贫的有效社会动员模式,让“寒门贵子”不再因“稀”而“贵”,对其“神化与认同”的效应也将得以缓解。为此,有关方面除了要采取积极措施来改善寒门家庭的经济条件,以避免某些学生因家庭经济条件欠佳而被迫放弃学业,还应持续保留教育精准扶贫中结对帮扶、部门联动等社会动员机制,促使乡村地区分散且有限的社会教育资源形成育人合力。另一方面,丰富农村地区优质社会教育资源供给。既要引导科技馆、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社会教育机构面向农村学校供给系列化、个性化学习资源,同时还需“鼓励本地课外辅导机构的发展或引导城市地区课外辅导机构向农村发展”^{[40]172}等措施,进而促进乡村社会教育资源总量与覆盖面皆得到不断提升,以弥补寒门学子在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方面的“先天不足”。

(四)多元看待“寒门学子”的立体化处境,进一步畅通成才路径

受制于社会发展阶段、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足以及个人禀赋差异,想让每个寒门学子都能够考上重点大学,从而实现“鲤鱼跃龙门”的阶层跃迁,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不可能实现。然而,寒门学子并非只有成为社会标榜的“贵子”一条出路,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在契合社会发展需求的轨迹上找对人生航标,寒门学子一样可以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职校生、二本学生以及提前进入职场的学生群体,理应被视为寒门学子的主体。

一方面,在认知层面应消除对“寒门学子平凡化”的“矮化与质疑”效应,树立“人人可成才”“时时可成才”“处处可成才”的人才观,不将高考成绩视为评判寒门学子成功与否的唯一指标,更加注重道德情操、社会贡献、家庭幸福、人生美满等维度的评价引领。另一方面,在支持层面要为“寒门学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体系,推动有关部门采取均衡城乡优质教育资源、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畅通多元化成才渠道、为处境不利群体子女提供学习服务支持等措施,使得寒门学子走向美好生活的路径越来越多元,而不必非要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不撞南墙不回头”方式来实现人生价值。尤其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拓宽寒门学子成才通道,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精神和要求,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方针政策,不断提升职业教育的市场吸引力和美誉度,为

寒门学子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加宽广的平台与更加多样的可能。

[参 考 文 献]

- [1] 鞠法胜,刘卫平.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研究述评[J].重庆高教研究,2023(02):113-127.
- [2] 中国新闻周刊.清华农村生源重新超两成,寒门出贵子更容易了吗?[EB/OL].(2020-9-17)[2024-10-25].<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8054755572807179&wfr=spider&for=pc>
- [3] 光明网.“农村户籍学生占比近年最高”点燃社会流动灯火[EB/OL].(2021-9-8)[2024-11-22].https://epaper.gmw.cn/zhdsb/html/2021-09/08/nw.D110000zhdsb_20210908_1-08.htm
- [4] 周勇.寒门学子的教育奋斗与社会上升:历史社会学视角[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4):94-99.
- [5] 李静.寒门学子的媒介话语权研究:以羊城晚报寒门学子高考报道策划为例[J].青年记者,2013(29):37-38.
- [6] 余秀兰,韩燕.寒门如何出“贵子”: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阶层突破[J].高等教育研究,2018(02):8-16.
- [7] 李晓亮.农村高中日常教学实践与高考改革之脱节:为何“寒门难出贵子”?[J].全球教育展望,2020(03):75-89.
- [8] 安妮特·拉鲁.不平等的童年:阶层,种族和家庭生活[M].宋爽,张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9] 程猛.“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 [10] 杜亮,刘宇.“底层文化资本”是否可行:关于学校教育中的文化资本与社会流动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J].中国青年研究,2020(05):36-42.
- [11] 周红云.社会资本: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的比较[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04):46-53.
- [12] 郭书剑,王建华.寒门贵子:高等教育中精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冲突[J].高等教育研究,2018(10):21-30+36.
- [13] 朱伟珏.“资本”的一种非经济学解读: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J].社会科学,2005(06):117-123.
- [14] 郑也夫.吾国教育病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 [15] 2023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EB/OL].(2024-01-17)[2024-10-25].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1/t20240116_1946622.html.
- [16] 魏易,薛海平.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校外培训的消费行为研究:基于2017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分析[J].教育学报,2019,15(06):68-81.
- [17]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07):36-50.
- [18]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典藏版)[M].杜继东,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 [19] 皮埃尔·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20] 蒋承,罗尧,张雨晴.贫困大学生学业成就与道德发展的影响机制[J].教育研究,2020(06):134-144.
- [21] 张从志.职校年轻人[J].三联生活周刊,2020(37):90-96.
- [22] 司洪昌.嵌入村庄的学校: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 [23] 黄灯.我的二本学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 [24] 刘伟.家庭教养与寒门子弟的学业获得研究综述:民族志视角[J].少年儿童研究,2023(05):83-90.
- [25] 贺秋平.好家风成就寒门贵子[J].中华家教,2018(10):26-27.
- [26] 吴春燕,刘金典.“90后”农家学子的教育获得与阶层突围[J].高教论坛,2024(04):120-124.
- [27] 王旭清.寒门温室:城镇化中农家子弟教育的家庭参与机制[J].中国青年研究,2021(12):98-105.
- [28] 林晓珊.境遇与体验:一个阶层旅行者的自我民族志[J].中国青年研究,2019(07):15-23+37.
- [29] 伯恩斯坦.阶级、符号与控制:教育传递理论之建构[M].王瑞贤,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
- [30] 子午.“寒门难出贵子”是全社会的悲哀[J].今日中国论坛,2011(09):81.
- [31] 韩哲.不能坐视“寒门难出贵子”[N].北京商报,2014-04-30(002).
- [32] 陈光俊.莫让“寒门难出贵子”[N].云南日报,2011-09-06(007).
- [33] 李春玲.“80后”的教育经历与机会不平等:兼评《无声的革命》[J].中国社会科学,2014(04):66-77+205.
- [34] 田汉族,王东,蒋建华.“超级中学”现象演化的制度逻辑:以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黄冈中学为例[J].教育与经济,2016(05):3-11.

- [35] 杨璐. 毕业后的漂流:“985 废物引进计划”[J]. 三联生活周刊,2020(37):34-48.
- [36] 梁晨,李中清,张浩,等. 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J]. 中国社会科学,2012(01):98-118+208.
- [37] 应星,刘云杉. “无声的革命”:被夸大的修辞——与梁晨、李中清等的商榷[J]. 社会,2015(02):81-93.
- [38] 李涓,曹良志,王秋旺. 专项计划实施成效及发展方向建议[J]. 中国民族教育,2023(06):4-6.
- [39] 廖青. 精英大学中农村学生的学习经历:对再生产理论的省思[J]. 高等教育研究,2016(11):77-84.
- [40] 庞圣民. 市场转型、教育分流与中国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1977—2008):兼论重点中学制度是否应该为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买单[J]. 社会,2016(05):155-174.

The Logical Dimension, Problem Examination, and Rational Return of the Phenomenon of “The Elite with Poor and Humble Family”

Huang Ling¹ Hao Mingjun²

(1.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2. Colleg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e issue of “noble sons from humble families”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nd sparked heated discussions. Based on Bourdieu’s tripl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social capital, cultural capital, and economic capital,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he phenomenon of “noble sons from humble backgrounds” reveals the “paradoxical” logic of social capital, imprints the historical image of cultural capital logic, and reflects the 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 capital logic. However, the resulting problems are characterized by deification or dwarfism towards students from humble backgrounds, affirmation or questioning of family education methods, and recognition or questioning of talent cultivation and selection system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guide the theoretical regression of the phenomenon of “poor family noble sons” from multiple paths. Firstly, deepe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explore the multiple values of the phenomenon of “poor family noble sons”. Secondly,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whole process education, promote the phenomenon of “noble children from humble backgrounds” to become the norm. The third is to improve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between families,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and enrich the cultural capital resources of “underprivileged students”. The fourth is to view the three-dimensional situation of “students from humble backgrounds” in a diverse way, further facilitating their path to success.

Keywords: the elite with poor and humble family; educational equity; logical dimension; rational return

[责任编辑:刘力]